

段鼎周 著

迷茫的 风云

——探索云南古代文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迷茫的风云

——探索云南古代文明

段鼎周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云南民族出版社

A Confused History

—Explore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Yunnan

By Duan Dingzho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迷茫的风云:探索云南古代文明/段鼎周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 11

ISBN 7 - 5367 - 3056 - X

I. 迷... II. 段... III. 文化史—云南省—文集
IV. K297.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1623 号

责任编辑:奚寿鼎
责任校对:陈江涛

英文翻译:张霞
装帧设计:何志明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 邮编: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制	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
开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14
字数	400 千
版次印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67 - 3056 - X/K · 772 定价:40.00 元



段鼎周 昆明市科学技术协会荣誉委员、白族学学会副理事长、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顾问。出版有《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合著）、《白子国探源》；参加编撰《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系列·白族卷》（编委、副主编）；发表文章近百篇，本书系从中筛选而成。

探索云南古代文明 ——代自序

常有人问：“你搞工的怎么搞起史来？”我也常戏答：“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那场“革命”“革”掉了我继续搞工的条件，被“发配”到一家工厂当车间主任。在那“革命”喧嚣的年代，我觉得只有读书才能净化心灵。虽说那时以“读书无用”为时髦，但“影射史学”横行，史籍是不难找到的，于是一只脚插进了史学。

当触及西南民族史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一个神秘的“文化王国”，深深把我吸引。后来我调昆明市科协任副主席，公务多了，但业余仍不放弃读史。还积极参加史学方面的学术会议以吸收营养，巴蜀历史文化、爨文化、郑和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等，能挤得进去的我都参加。但“挤”得要有块“敲门砖”——论文，于是也班门弄斧，附庸一下风雅，学着做起学问来。我的老同学杨庆斌赠联云：“攻史志洞晓兴替；用科技深知苦甜。”感谢他的理解。上班科技，下班文史。也常为“爬格子”所苦，但其间也有乐趣。

退休后，一些公司邀我参与其事，都推却了，愿以更多的时间读

史。现已出了两本史学专著。发表的近百篇文章，也绝大部分是史学的。身处史学圈外，没有功名利禄的压力，也没有谁给你布置功课，读起来领域自由心境平和，也是一种享受。

* * * *

读书，不能“躺”在书上读，任凭作者牵着鼻子走；读史，要读到原著，不能人云亦云。古代圣人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因此要“站”在书上读，经常和作者讨论；要刨根问底，寻求最早史料。

有一事感受很深。一位前辈论及楚国在世界史上黄金空前之多，是因曾在四川丽水（犁牛河）地区大量开采黄金，以岷山庄王和滇王庄蹻为其在川滇的代理人来经营，通过当时还存在的“雅砻江 + 龙川河 + 礼社江和红河”这条“大河”东运黄金到楚都江陵的。后龙川河地层因地震上升，因此龙川河就不再入礼社江而改向北流。还说这条“大河”就是《汉书·地理志》所称的“恒水”，在东汉时仍作航运。说这是丁文江考察的结果。如果上古时代云南存在着这样一条沟通南北的大河作为运输黄金的水道，也许云南上古史应该改写，读了颇为怀疑，于是逐一查阅史据。首先查阅地质学家丁文江1919年5月的游记《金沙江》，他确实提出：“我的意见是从川边来的雅砻江，与龙川河、红河本来是从北向南的一条大江。以后雅砻江的水被自东向西推进的扬子江抢去了。于是雅砻、龙川、红河就变成三条不相通的江。”这段话讲得很清楚，“大河”的不复存在原因是河流袭夺，指的是河流在发育过程中夺取邻河上游的现象，而不是简单讲的地震所能造成的。况且龙川河地区在历史时期没有超过Ⅶ度的地震记载。又查孟宪民、任美铎等地学权威的研究成果，他们一致认为扬子江在这一地带的河流袭夺发生在上新统末或第四纪初，这已经是两三百万年前的事了。再查《汉书·地理志》，“越巂郡遂久县（丽江）”说：“绳水（金沙江）出徼外，东至犍道（宜宾）入江。”又“蜀郡旄牛县（汉源南大渡河南岸）”说：“若水（雅砻江）亦出

徼外，南至大笮（盐边）入绳。”再“益州郡弄栋县（姚安）”说：“东农山毋血水（龙川河）出，北至三绛南入绳。”说明三条河现在的格局早在西汉以前遥远的年代就已形成，雅砻江和龙川河是以南北相反的方向入金沙江，所谓“大河”已经不存在。至于“桓水”《汉书·地理志》系于“蜀郡”，即今白龙江，发源于西倾山南，屈曲东南流至甘肃舟曲东与古羌水即今岷江合，又东南至今文县东与白水江合，东南流入嘉陵江，与所谓“大河”毫无干系。误将地史当历史，差之数百万年。我这点质疑不可能发表，然不时提醒我对史料要小心翼翼。

许多历史问题，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有的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不能胡推。真理跨前一步就是谬误。如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猿人化石是元谋人，有的就急于判定元谋人是现今西南哪个少数民族的祖先，有的甚至画出了谱系。最早的人类起源指的是从猿到人的过程，还不是智人的出现过程。就是智人也还谈不上与区域和民族的联系，只能说他是世界的。当代科学还没有办法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做文化和族群上的分类。此类尚无科学证据问题的推论，还是悠着点为好。又如图腾崇拜也热过一阵子，有人谈图腾层次，说有原生的有次生的；有的论到部落图腾、民族图腾等。图腾本来是氏族的范畴，图腾观念的象征物有“亲属”和“标记”的含义。中华大地，远古氏族如满天星斗，由于氏族离我们已经太远，究竟有多少图腾，只能冥会而难以尽言，仅凭某些残迹而建立什么体系，我觉得尚不可能。

古代社会丰富多彩，令人神往，但必须科学地进行探索。

* * *

年轻人富有进取精神，思想敏锐，和他们合作可以受到感染，颇得益处。

上世纪80年代，我和刚出校门的徐冶、王清华合作出过一本书，名《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虽说由我总其成，但许多新意是他们的。从选题来说，也正好碰在即将出现的西南丝路热的前夕，成为介绍这条

古道的第一本书。此后，考察札记、研究论集、大型画册、电视系列片等接踵而来，振兴西南丝路，把云南推向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前沿，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现在他们已是中年，都事业有成，硕果累累。我还留恋这段合作，是因为我也在他们的进取精神和敏锐思路中得到许多启发。

作为学术研究，有的学者不同意西南丝路在西汉前即已开通的看法，认为当时尚不具备条件，于是我又对“条件”作了一些研究。依我之见：从地理环境而言，古代人们对交通的开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理条件。古代东、西文明之间，有世界上地势最高的青藏高原为障碍，难以从世界屋脊上开辟商道。我国西北深入亚洲大陆中心腹地，西南又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在这样的条件下，东、西方交通自然分两道绕开青藏高原，或沿青藏高原北缘的昆仑山、祁连山北侧，或沿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东侧，再没有其他取道比这更便捷的了。北方丝路虽途经戈壁沙漠，但其间不乏绿洲、湖泊，西南丝路要越深谷高山，但避开山岭险峰，沿着河谷、盆地，物产丰富，足以给过往商人提供食宿补充给养。从人文基础来看，远古的人们早就在西南的河谷盆地一块块一层层的聚居，稻米、铜鼓早从此传播四方。北方民族南下，南方民族北上，早已在此进行，被称为民族走廊。远古的人们经过漫长时期的文化传播和民族迁徙，才逐步形成明确而连接的商道。从社会经济而言，西南地区的一些地方，至近代还存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但在丝路沿线西汉前也有过光辉的古代文明。古蜀国，号称“天府之土”，杜宇时期即以“南中为园苑”。战国时的楚国，即以盛产荔枝而驰名，输出“楚僮”而著世，被誉为“夷中最仁”。曲靖的八塔台古墓葬群，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已是中原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通道，其主人可能是史称的劳浸靡莫之属，其势力不小。滇池周围的滇国，起于公元前6世纪，西汉使臣回长安后向武帝进言，是“足事亲附”的“大国”。楚雄万家坝，在春秋中晚期青铜已很发达，拥有国内最早的鍍金技术和铸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铜鼓。祥云

大波那，发掘了战国时期罕见的巨大铜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足见。川西南的谷地，西汉前分布着“称王称侯”部落统治者，他们的部落所在地称“都”，如徙都、笮都、邛都等。洱海周围的叶榆国，曾是西南夷以什数的“王国”之一。再往西的哀牢国，其“王出射猎骑马金银鞍勒加翠文饰”，是商贾很发达的西南门户。西汉前丝路沿线的古代文明，足以维持一条商道是无疑的。丝路沿线，西汉前的古墓葬中发现了数量不等的贝，其中，滇国故都石寨山贝的总数达14.9万余枚，江川李家山达11.2万余枚。云南不产贝，都是从印度洋北部沿海地区舶来的，是商业往来的见证。从古代交通技术进步而言，栈道、索桥的创造和西南马的培育，这三项伟大创造，在战国时期已经成熟。春秋时期成功地修筑了穿过秦岭的栈道，即褒斜道，打通了由汉中至关中的道路。战国时期又修筑了联系汉中和巴蜀的石牛道，西南丝路上的栈道也在这时逐渐开凿。川西南的古代笮族，开“横索”为桥的先河，至迟到秦代笮桥已发展到骈索阶段，则独索也在战国时代已经普遍使用。长鬃、身材矮小、行动敏捷的西南马，我们在古滇国青铜器上已看到它们的形象。这三项创造，足以构成西汉前西南丝路形成的技术前提。西南古代的技术发展较早，成就显著，只不过因循封闭明显，缺少交流，因此发展缓慢。只要对西南的地理环境不要看得片面，古代的人文环境看得那么惨淡，是会得出正确结论的。对此，也发表了几篇论文。

与西南丝路形成时间有联系的是民族走廊发端于何时，这也是理解西南丝路形成的一个重要史据。古史的明确记载是秦献公初立（公元前384年）之时，河湟羌人爰剑之孙阴害怕秦国的攻伐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后来他们的子孙分为三支，即在武都地区的参狼羌、白马地区的白马羌以及越巂地区的牦牛羌。文献记载比较晚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甚至猿人时期，然我们讨论的是民族迁徙，是古民族形成以后的民族群体迁徙的问题，不涉及猿人的迁徙，又显过早。也有人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但又过于笼统。从文

物方面来考察，民族迁徙反映在考古文化中，是他地他族文化，即直接由拥有这种文化的载体——他地他族的人遗存下来的，有深刻的他地他族的内容。在川西南及滇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晚期是竖穴土坑墓和瓮棺葬，是土著居民留下来的。但自春秋以至西汉，葬俗多样化了，新出现了石棺墓、火葬墓、石板墓和大石墓。在氏族部落时期，葬俗很能反映血缘与氏族关系的联系和社群与社会的集体意识。这些新出现的葬俗，大体可以说是民族走廊上最早迁徙的民族留下来的遗迹，反映的是大规模的连锁性的多个民族集团迁徙的发生。同时滇西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原来土著民族所没有的器物，如弧肩形铜斧、双环首青铜短剑、头箍及双耳罐等，是北方民族的。又从与古羌族系有关的西南彝语支的一些民族的口传和文字经典来考察，也说他们是从北方迁来的，都说他们最初的世界是有雪的山川，彝族经典说他们的一世祖希母遮“自旄牛徼外”入居越嵩郡，按谱系计算大约在殷周之世，到三十一代笃慕才六祖分支，大约在战国时期。再从古代气候变迁来看，古气候学家一致认为，距今8 000~3 000年，我国经历了一个长达5 000年的持续温暖期后，出现了冷暖周期性交替变化。西周是一个寒冷期，北方牛羊冻死，草木尽枯，常见于史载。这样的气候环境，迫使西北的游牧民族东移南迁，以寻求温暖一点的地区生活。他们东移的规模很大，不断与周王室发生激烈战争，到周平王只有“东迁于洛邑，辟戎寇”，是为春秋。羌人南下亦当此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没有驯养马，而剑川西湖青铜遗址中发现了驯养“蒙古马”类的遗骨，此后云南马的数量渐增，这显然是民族走廊上南下的北方民族迁徙的运载工具。这个遗址据测定为公元前11世纪，由此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民族走廊发端于距今3 000年前后的周初，其始动力是西北游牧民族受不了气候的变冷而南迁的。为此我发表了《西南民族走廊发端探讨》，然而也惹来了许多麻烦，这里要你入“名人辞典”，那里要推荐为“国际优秀论文”，有的聘当“特约研究员”……我只是圈外读史，不须“名牌加身”，

只有一概不理。

学习要坚持不懈，探索要不断创新，这是我希望的。

*

*

*

*

退休后我主读白族的历史文化，这大概是思乡的情怀吧！

我国的考古工作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只是证明传统古史，只是进一步肯定中原文化的摇篮地位，把黄河流域以外的中国视为是不断接受中原文化才进入文明阶段。白族族源的研究也很难跨过这一条金科玉律。到上世纪70年代，中原以外地区古代文化资料大量出现，表现出意想不到的水平，足以与中原相媲美。同时自1972年开始，使用放射性碳素断年的技术，证明了许多中原以外的边疆文化不比中原文化为晚，引发了对古代史认识上的革命性变化。正像考古学家们所形容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认为中国没有一个新石器时代起源的问题，也不存在向四方传播的问题。社会学家也构架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概念。洱海区域文化也是满天星斗中的“一颗星星”。

这颗“星星”是由比较密集的原始农耕聚落起源的。公元前2000年的宾川白羊村以及与之年代相当的洱海两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商代末期的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遗址，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的剑川鳌凤山青铜遗址，以及战国早期的祥云大波那青铜遗址。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将没有文字记载的洱海地区的上古以至远古社会带进了历史学的研究视野之中。前后连续的以梗稻为主的农耕社会，土坑墓的墓式，石器和铜器器形、纹饰的继承，可以说明整个洱海区域的青铜文化，是从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的，有的直到当今的白族社会，还能看到它们的形态。白族世代传唱的创世史诗、开天辟地的神话以及其他古老传说中，有对恶势力的斗争，但没有民族之间的械斗；有与自然力作斗争的故事，反映的都是苍洱的山川风物；有外出求知识学技能的事，却没有举族迁徙。这些虽然不能完全当成史实，但也反映了白族源于洱海区域，其最早的先民就是当地的原始农耕民

族。方志野史中的白子国，也将白族先民的历史追溯到了西汉。

同时，对以往构成白族族源外来说的三条史料也提出了质疑。

一是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但没有到叶榆（今大理），也没有得到大理地区民族的全面信息，因此在《西南夷列传》中，漏载了洱海区域原始农耕民族的存在。他说的“同师”当在丽江一带，“嵩昆明”指的是嵩地的昆明人。他那段有关洱海以东北的文字应读为：“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也就是说：西自桐师（今丽江）以东北，西南接叶榆（今大理），这数千里是嵩地的昆明人游牧之地，阻通身毒（今印度）道汉使的昆明正是这个地区。而在昆明人西南的洱海区原始农耕民族，创造了云南最早和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和云南最早的青铜文化，形成滇文化的源头，他们正是白族的主要先民。

二是元·李京在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奉命宣慰乌蛮”，在乌蛮、六诏、金齿、白夷曾奔走几遍，其所撰《云南志略》说“中庆（今昆明）、威楚（今楚雄）、大理、永昌（今保山）皆僰人”，这是他亲历目睹，符合事实，惟其族源则大失考证，仅按字面举了若干白语，并没有与古僰语能够对照，即结论这些白人是古僰道（今宜宾）的僰人转化而来的。溃散于秦的僰国，仍散居于川南和滇东北一带，与僚共处，包含在被称为泸夷、叙泸诸夷、泸戎、都掌蛮或僰僚之中，至明称为僰人子，他们正在僚化，曾长期反抗明王朝的强暴，谱写过鲜为人知的光辉历史篇章，仅留下了千仞绝壁上的奇观——悬棺。白人虽有时作僰人，但和古僰人没有关系。

三是《蛮书》卷四有“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之句。“二十余万户”当有百万之众，唐天宝年间云南的总人口还不足其五分之一。又永昌一城焉能容百万之众。当时南诏乃初创，也没有那么大的兵力迫使那么多的人口迁徙，而且也无必要。“万”显为衍文，实情乃徙二十余户西爨白蛮贵族于

永昌城，故下文有“（爨）日用子孙，今并在永昌城界内”为证。樊绰没有到过云南，其《蛮书》乃采集前人记载及访问所得，是南诏史事重要典籍，然个别疏漏也在所难免，说西爨“荡然兵荒”，乃失考后的画蛇添足，不足为信。而且，所谓西爨白蛮、东爨乌蛮，是滇东和滇东北的彝族先民，虽有个“白”字，其实与白族无关。

我认为白族源于洱海区域原始土著农耕说应该成立，便写了《白子国探源》一书以论白族源流。虽是一得之愚，不敢言其必是。得到马曜教授的鼓励，赐序中说：“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倡学术论辩上取长补短，而不是随声附和。‘和而不同’是我国自西周以来先秦思想家的卓越理论和宝贵实践，并为后世继承的中华文化的传统……学术研究总是以各自的视野、角度和方法，提出自己的新的观念、新的发现，才能带来学术的繁荣。”此书在白族学学会的支持下得到出版，我的老同学施珍华有诗赠曰：“云南大理史悠悠，泛海钩沉几度秋。白族源流知何在？书中解惑是鼎周。”

在探索白族源流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大理的历史文化，俯拾皆是，灿若星河。鲁迅读书，读出了“三味”，“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醢醢”。读史之乐，其乐无穷。

[2003年1月应大理白族文化研究所之约而写]

目 录

探索云南古代文明	
——代自序	(1)
中华民族的内聚精神	(1)
洪水神话产生的时代和环境	(18)
图腾崇拜的实质及其相关问题	(26)
九隆神话的厄运	(36)
西南民族走廊发端探讨	(41)
西南丝路在西汉前形成的环境和条件	(51)
栈道·索桥·西南马	
——西南各族在交通史上的卓越贡献	(60)
海、陆“丝路”与我国的对外开放	(69)
从历史上看云南的对外开放	(82)
古滇国始末小议	(93)
先“盗”后“王”宁有理乎	(96)
汉武凿池为何名“昆明”	(101)

盟誓文化与明月社

——试析爨文化的一个元素	(105)
爨人、西爨白蛮和白人，各有自己的源流	(122)
隋文帝治南中官吏三事	(134)
天宝安宁盐井之争	(138)
昆明历史沿革琐谈	(144)
琐谈“沙壶”与“虎文化”	(152)
谈云南古代信物——符	(159)
索作卉考	(161)

郭仲翔为奴不是南诏史料	(164)
说“天降铎稍”	(166)
读《大理古佚书钞》随感	(172)
献身于民族团结的人——郑回	(180)
《游避风台》诗作者是谁	(185)
南诏地名“睑”“𪛗”有别	(187)
南诏官员的告身是谁授予的	(193)
南诏后期的雨铜观音	(198)
大理国八位国王避位为僧的分析	(207)
段思平故里小考	(218)
剑川古史寻踪	(226)

白族是较早开放的民族	(266)
“鹤拓”新解	(281)
“叶榆国”初探	(286)
“嵩昆明”和“同师”新考	(296)
白子国试辨	(304)
唐代洱海地区的民族分布及其变迁	(311)
对“封民”的一点补充意见	(319)
南诏王室的白蛮化	(321)
略论“白文”和白文的创制	(328)

开放的神灵世界——本主	(347)
本主与鬼主辨析	(351)
“布燮”的由来和回归	(359)
绕三灵和石宝山歌会的由来	(369)
白子国再辨	(379)
白族源流之管见	(394)
南诏大理主体民族的表述问题	(406)
附：历史故事三则	(412)